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他

主持人的话 在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学术争论中,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且其流派内部也在发生分化,出现了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划分。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随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的出版以及学界对之所作的各种评价,国内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作为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也有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联盟的起源》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和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的《战争的原因》等代表作的中译本问世。一些相关理论,如“攻防理论”(offense-defense theory),国内也已有较多讨论。而新古典现实主义,由于其最初作为一个流派被正式提出大约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上述三个分支当中是最晚的,即使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所展开的讨论迄今也不甚系统。国内近年虽有学者陆续撰文加以引介,并翻译出版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法利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的力作——《从财富到权力》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还仅仅是开始。

自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于1984年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新现实主义的贫困》一文之后(该文后被收入1986年出版、由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经典文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这两个术语开始为学界所广为接受。前者主要反映在汉斯·摩根索、阿诺德·沃尔弗斯和基辛格等人的著述当中,重点关注国际政治中国家权力的来源及其运用,以及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后者以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为代表,主要试图解释体系层次上的国际行为模式,如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国家为什么往往会去制衡强大的国家等大问题。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则试图将两者综合起来,以更好地解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不同国家在面临相似的外部环境制约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对外政策。与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关注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单元层次上的因素,并且以建立国家的对外政策理论为己任,而并不像新现实主义者那样追求建立一种体系理论。但与此同时,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又比古典现实主义者更具备方法论的意识,而且接受国际结构限定国家的政策选择这一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并将之作为自己论证的起点。

遵循这样的研究路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不同时期英国、美国、德国、苏联和

中国的对外政策或大战略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经验考察,并形成了一个拥有相似研究纲领的学术共同体,主要成员有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兰道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和扎卡利亚等人。1998年,美国学者吉登·罗斯(Gideon Rose)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对外政策理论》一文,在对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并为学界所接受。之后,围绕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纲领,又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又有一些年轻学者崭露头角,如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Taliaferro)、詹妮弗·斯特林-福尔克(Jennifer Sterling-Folker)、科林·迪尤克(Colin Dueck)等。

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既吸收了新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力量对比)观点,又秉承了古典现实主义重视单元层次、个人层次和对外政策分析的传统,在尽量不损害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尝试将决策者的认知、政府能力、官僚政治和政治文化等新的变量引入到解释框架中,从而建立一种综合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之长的对外政策理论。虽然其理论体系和论证过程现在还难称完善,但由于其在理论的严密性、论题的政策相关性和论证材料的丰富性三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因而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从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是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颇有活力和影响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代表了既有对外政策理论中一批最优秀的成果,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有鉴于此,《外交评论》拟于最近几期陆续发表新近国内学者就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他相关理论所做的研究和评析,希望在继续跟踪国外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之余,能够激发学界的讨论,并进而推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为开篇语。

于铁军

2009年 6月